

妇女参与的起点

主 编 朱楚珠

副主编 彭希哲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国家教委/联合国人口基金204项目

「妇女就业与生育率」课题丛书



序

言



国家教委/联合国人口基金 1990—1995 年的 P04 项目，确立了妇女就业与生育率关系研究课题，按课题设计要出版一套系列丛书。本书《妇女参与的起点》是妇女就业与生育率研究系列丛书中的第一本，它想在本领域架起一座历史、现实和未来之间的桥梁；经济参与是妇女参与的基本形式，而就业又是经济参与的基本形式。这样，就生成了这本书的书名。

围绕着妇女问题，在怎样对待传统、现实和创造未来上，也是众说纷纭的。悠悠中国史，给妇女留下的是什么？对她们的的发展，传统给予的行为规范是促还是抑？如何评估妇女的现状，期望着的未来又该是怎样？其中有极为丰富的命题需要人们去研究。中国地域之大，人口之多，地区差异之明显，现实政策力度之强和多样性，需要人们研究的问题尤其丰富。

妇女就业与生育率关系是妇女问题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传统意识中女主内与妇女走向社会、参与经济的期望有没有冲突，1949 年以来长期执行的以重工业为主的方针，对妇女就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会给妇女就业提供多少机会，中国农村经济结构

调整和多元化经济体制与妇女就业形式有什么关系，等等，所有这一切有关妇女就业的变量又通过哪些中间变量，作用于妇女期望家庭规模，进而影响生育率；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节能力强，又如何通过宏观调节机制，加强中间变量的力度，使其向低生育率方向变化，如此等等，在中国均没有作过系统的研究。人们曾经局部地说明过其中之一二，却没有形成系统的认识和理论，国际上70—80年代，就有不少对此问题的研究，却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所以，本系列丛书将从基本理论出发，并利用所获的基础数据验证基本理论，对上述一系列问题提出我们的见解，力图全面地把握历史，准确地分析现状，科学地预见未来，为中国妇女的经济参与和生育率控制提供决策依据。

从本课题来说，沟通历史、现实、未来的桥梁已不仅在书中、在纸上或存在脑海中，建桥工程已开始于中国大地。我们在陕西洛川和安徽凤阳县建立了实验点，在实验点上把理论变为行动，改变现实。1993年，本课题实验点经验已在19个县推广，实验点本身也将得到进一步发展。

与本书主题相关的研究在国内还有许多部门的专家学者在进行，所以，本书选辑了部分来自中国其他妇女研究领域的论文，并特请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陶春芳女士和全国总工会郭彤女士撰写了论文。

本课题是一个跨校际的课题，总课题及子课题负责

人分别是：朱楚珠（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经济研究所）、彭希哲（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韩常先（杭州大学人口研究所）、郑桂珍（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胡平、王海涛（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经济研究所）。上述三校人口研究所还有一批同志参加课题研究工作，在本书各章之后，均署了完成者的姓名。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经济研究所的刘叔文同志为本书作了文字处理，陈杰同志为本书作了图，在此一并致谢。

我们像怀抱着新生的婴儿，把她——《妇女参与的起点》献给社会。

朱楚珠

1994年6月

目 录

第一章 体系的多变量与探索的多方位

——妇女就业与生育率关系研究现状综述

- 一、主要观点及理论…………… (2)
- 二、影响因素与变量及有关的研究方法…………… (8)
- 三、发达国家——妇女就业与生育率的负相关关系 … (18)
- 四、发展中国家——妇女就业与生育率关系的多样化
…………… (25)
- 五、结语 …………… (29)

第二章 总体理论框架、研究设计和初步分析

- 一、概述 …………… (32)
- 二、研究的意义 …………… (43)
- 三、研究的方案 …………… (52)
- 四、对调查结果的初步分析 …………… (60)

第三章 子课题的研究设计和阶段成果

- 一、经济发展与妇女就业趋势 …………… (74)
- 二、农村女性人口的文化教育水平和专业
技能对妇女就业及生育率转变的影响 …………… (92)
- 三、计划生育与妇女就业…………… (117)
- 四、就业与生育行为对中国女性生命周期的影响…… (137)
- 五、生育价值分析与生育补偿理论及实践研究…… (169)

第四章 来自洛川实验点的报告

- 一、背景..... (197)
- 二、洛川的经济发展与妇女的经济参与——妇女就业
..... (201)
- 三、洛川的人口与妇女生育..... (207)
- 四、妇女广泛参与社会..... (221)
- 五、展望..... (224)

第五章 国内妇女研究领域论文选

- 一、妇女社会地位与妇女发展..... (225)
- 二、女职工生育保险制度改革的思路与实践..... (240)

第六章 附件

- 一、国外有关妇女就业和生育率研究报告介绍..... (256)
- 二、本课题设计的个人调查表..... (364)
- 三、系统动力学简介..... (385)

第一章

体系的多变量与探索的多方位

——妇女就业与生育率关系研究现状综述

全球范围内,有关妇女就业与生育率关系的探讨,已引起并继续引起各国研究者的兴趣,有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陆续问世。在以往的生育率研究中,对于就业因素的影响较少考虑,同样,研究妇女就业问题时,对于生育率的制约也未给予足够注意(甚至于70年代联合国组织的WFS调查亦如此)。随着妇女参与经济活动的广度与深度的持续增长,妇女受教育水平及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新的技术革命带来了观念改变并为妇女就业提供了广阔前景,妇女就业状况(无论以何种形式)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及影响因素变得越来越不容忽视。

妇女就业与生育率之间,不呈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受诸多显现的或隐含的因素制约,并且随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所发生的情况差异很大,不严格遵循同一规律,甚至有时大相径庭,不同地区表现出不同特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亦呈现

不完全相同的模式。然而,妇女就业与生育率之间的影响和制约关系的存在是肯定的。新的研究方法的引入和创立,使这一领域的研究逐步深入,二者之间关系及影响因素被进一步认识,研究成果更趋于合理而为更多的人乐于接受。

一、主要观点及理论

在诸多研究成果中,来源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彼此互补的两种观点当推首要。前者应用基本的社会学理论分析,后者使用经济学观点阐述,两者共同构成分析妇女就业与生育率关系的理论基石。

(一)角色不相容假说

以杰夫(Jaffe)、威尔勒(Weller)为代表的研究者们,从社会学角度出发,提出角色不相容假说,认为妇女在日常生活中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母亲和工人是其中二者。该假说认为两个角色越不相容,就业与生育率之间负相关性越强。换言之,如果社会经济生活使得妇女就业与生育难以两全,则就业与生育率的反向关系成为必然。一旦无此限制,反向关系不复存在。

角色的不相容性来自与常规角色的不协调或与时间的不协调,或两者兼而有之。当社会不赞同母亲的非家庭角色时,会出现与常规角色不协调;当抚养孩子的时间与就业时间冲突时,会产生时间不协调。

科莱威尔(Coliver)和朗戈露易斯(Langlois)认为,在历史上,工业化国家母亲作为劳动力的观点并非难以接受,在传统化国家,则期望妇女在一生中扮演的主要角色是妻子、母亲和家庭主妇。非

家庭就业常常被视为与妇女的家庭职责角色不符的常规不协调。

如此消极的社会观念并非一成不变。在发达国家,母亲(甚至有年幼孩子的母亲)走出家门去工作这一事实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随着比例不断增加的妇女获得学位,有关女性解放和机会均等问题的公开、广泛的讨论,许多妇女(包括母亲)感受到了社会的吸引力(或她们十分向往)而承担非家庭工作者的角色。

艾米斯克(Ermisch)、普莱瑟(Presser)及凯恩(Cain)认为,即使随着家务劳动分工的变化,父亲越来越多地帮助照料孩子,但人们仍认为成功地操持家务是妇女的唯一职责。难以理解的是,妇女并不期望减少影响她们工作行为的家务职责。奥本(Oppong),萨费莉斯-罗森查尔德(Safilions-kothschild)和威尔勒发现许多妇女想在两方面都获成功,于是,工作的母亲发现自己处在角色冲突的状态,并且较有声望、受人尊敬的工作常需要以更广泛、更高层次的文化水平为前提,而这无疑增大了女性双重角色的冲突。

就业妇女可以缓解角色冲突的唯一途径是减少她的对抗性责任来安排适当的工作时间比例。在强烈的就业要求和可调整的家庭规模之间,妇女趋向于选择较小的家庭。这一选择甚至使妇女能够花钱请人照料孩子或将孩子送入托儿所、幼儿园。由此看出,妇女就业与生育率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归于双重角色的行为不协调。在这里,符合角色不相容假说,即母亲角色和就业者角色之间的不协调性越大,工作母亲和非工作母亲生育率之间的差距也越大。

论述妇女角色不相容假说时,不得不论及常规不协调和时间不协调。虽然关于母亲参加工作的否定观点正在改变,但妇女仍旧与作妻子和母亲的常规期望相关联。彻林(Cherlin)指出,1970年,45岁以下的美国已婚妇女中,80%的人认为妇女应最先考虑照料

家庭,操持家务。若丈夫在外是取得一定成就的人,更应如此(这样一来,整个家庭的境况都会不错)。从整个社会来说,对妇女的如此期望与妇女自己的就业期望之间,产生了常规不协调。虽然美国的公开民意测验表明,妇女走出家门参加工作的最主要原因是她们的家庭需要她们的货币贡献,并且越来越多的妇女不仅为了实现个人抱负,并且为保持一定的家庭生活水平寻求就业,但一些调查仍表明许多妇女坚持认为应在工作和孩子中作出选择,即妥协于常规不协调。

米勒(Mueller)和斯威特(Sweet)认为与角色不相容假说密切关联的另一因素是时间分配,有限的时间是工作妇女最缺乏同时也是最宝贵的资源。就业妇女通常要承担家庭和户外的双重工作,对时间的需求必须在二者之间进行调整。如果一个妇女不能控制就业的时间需求,则似乎应以母亲的身份来限制家庭规模以减少家务劳动对时间的需求。

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常规不协调和时间冲突导致了低生育率,则可能会出现就业与家庭规模无关的情况。琼斯(Jones)、史密斯(Smith)及威尔勒发现就业与生育率无关的原因可能是角色的相容性。梅森(Mason)和斯坦汀(Standing)认为如果有一个有关的或父母般的代理人照料年幼的孩子,或作出其它经济可行的安排,这时,参加工作和照料孩子可能成为一致的。另外,若就业的妇女不离开家庭,角色不相容性就会减弱。因此,就业类型成为影响妇女就业与生育率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

狄克逊(Dixon)认为角色相容的工作多出现于以家庭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的传统经济的国家,这有助于解释在发展中国家就业与生育率相关性不明显的原因,在那里,工作妇女和非工作妇女具有基本相同的生育率,工作母亲就职于角色不相容性很小的家庭

就业行列中,生育和抚养孩子并不与她们的经济活动发生严重冲突。

(二)机会成本理论

建立在非常成熟的有关决策家务的微观经济理论之上的关于妇女就业与生育率关系的观点侧重于孩子的机会成本。机会成本的概念来源于经济学的时间分配理论,认为分配到某一具体活动上的时间的价值或成本由这一时间最有效利用后所产生的价值决定,多数情况下,可以通过确定有关市场上的报酬近似得到。该理论假设当孩子的机会成本随着劳务市场给予妇女机会的增加而增加时,生育率将会下降,因考虑生孩子需要花费成本,并权衡多种因素(包括时间和货币)后,妇女就会少生孩子。

本-波瑞斯(Ben-Porath),凯恩和威尔勒假定对于每一个妇女而言,生养孩子的机会成本越高,她具有低生育率的机会就越大;罗森(Razin)认为推迟或延误她生育的机会也越大;罗斯(Ross)和斯坦汀则认为她以缩短生育间隔来集中事业中断时间的可能性也越大。这些假设都依赖于极大值模型,该模型视工作或生育孩子的决策均为合理,进而评估每种选择的收益与成本。从某种程度上说,可以看到的工作收益和孩子的机会成本超过了可以看到的孩子收益,因此妇女可能选择加入就业行列而限制生育。这里需搞清的概念是人们都是明智的成本核算决策者,她们确实知道所花费的成本以及被限制的生育就是如此决策的结果。然而,这些概念的经验检验又是很困难的,尤其是明智的成本核算决策对人口再生产行为的影响这一假设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令人怀疑。

机会成本理论可以解释角色不相容假说,并指出妇女就业与生育率可能出现正相关的条件。如果照料孩子并不影响经济活动

并且不与准确、集中的就业时间相冲突,如果很容易找到照料孩子的合适人选,于是,照料孩子的机会成本就会较低,妇女就业与生育率可能会出现不相关或正相关联系。经济学家们假定对于那些必须放弃高薪照料孩子的妇女来说,孩子的机会成本是很高的,对于低工资的妇女而言,情形迥然不同,因此认为,妇女就业与生育率之间正相关或负相关并不绝对化。

显而易见,当角色不相容随机成本增加而强化时,角色不相容假说与机会成本理论得出相同的预言和结论。

尽管上述两种观点颇具影响,但因其未就生育率与妇女就业之间的复杂关系作出充分解释,未考虑抚育孩子的活动和水平等因素,未顾及职业差异甚至就业概念存在缺陷而受到批评。

(三)低生育力观点

生物学的再生产概念——生育力,也可以部分解释家庭规模和就业的关系。有学者认为,一些生殖能力较低和原发性不育的妇女被有选择地吸收到就业大军中来。换言之,相对生育力较低的妇女,即那些所谓“缓慢的养育者”们似乎比生育能力强的妇女更容易参加工作。这一线性推论基于费德曼(Freedman)等人的报告。费德曼和他的助手们核查美国的数据发现,所有年龄组中,不育妇女参加工作的比例偏高,因而得出结论,认为妇女就业与生育率关系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归于生育力。但简黛尔(Gendell),斯德克斯(Stycos)和威尔勒等对此持怀疑态度。目前尚无数据充分度量绝育,也没有经验证据说明大多数工作妇女都是生育能力低的。

(四)工作承诺学说

从心理学角度提出工作承诺学说,也试图对妇女就业与家庭

规模之间关系作出解释。该学说假设有强烈工作愿望的妇女,以保持较小的家庭规模为先决条件。萨费莉斯-罗森查尔德通过对希腊工作妇女和非工作妇女抽样数据分析后发现,妇女就业导致生育率降低,具有较高工作愿望的妇女生育率下降最大。他认为研究就业对生育率的影响时,应考虑工作承诺学说。

一些学者为工作承诺学说构造出框架。具有现代化观念的妇女认为女性应在社会中扮演一定角色。这些妇女对工作具有强烈愿望,认为工作与作母亲同样重要,因此她们的孩子较少或有些人干脆不要孩子。持传统观念的妇女把工作仅仅视为经济上的需要,如果她们受制于就业而限制生育,原因是她们不得不工作,并非渴望工作。

泰恩(Tien)给出了富有经验的推论,认为追求事业的妇女趋向于少生孩子。泰恩将工作的妻子和工作的母亲加以区别,工作的妻子如同事业型妇女那样偶然从她们主要的角色中腾出时间来生育孩子,而工作的母亲则偶然从她们母亲的角色中腾出时间来加入劳动力行列。作为对家庭角色的承诺而言,工作的母亲不象对工作承诺的妻子那样降低生育率。简言之,具有强烈工作愿望,自我选择加入劳动力行列的妇女是影响就业与生育率关系强度的主要条件因素。然而,它在妇女生育率差异中仅起一小部分作用,正如斯坦汀指出,应注意工作承诺概念的度量。

除上述外,还有一些观点和看法,试图完善和丰富妇女就业与生育率关系的理论。

有人提出家庭机会结构理论,认为家庭机会结构决定生育、抚育孩子的水平及家庭劳动力分配,这三者又共同决定妇女就业与生育率之间关系。在这里,强调母亲和孩子对家庭收入的影响,个人收入对家庭经济联合体的重要性及对孩子上正规学校的重视程

度。

有人认为工作妇女和非工作妇女的生育率差异主要是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而非就业状况不同所致,认为在得出角色不相容结论之前,有必要进行更精确的就业和社会地位概念的度量。

另一尝试改善角色不相容假说和机会成本理论的努力,则是把妇女角色的概念扩大为妇女在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七种成份:母亲、婚姻、家庭、职业、亲属、社会成员、个人。所有与这些成份有关的行为或期望都被认为会对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起作用,因而影响生育率。

二、影响因素与变量及有关的研究方法

当妇女就业与生育率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这一发现被首肯之后,学者们进一步探讨分别影响妇女就业和生育率的因素和变量及其对于妇女就业和生育率关系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并试图对此进行度量,因此,在深入研究各种因素的同时,研究方法的选择也十分令人关注。

有人认为妇女就业与生育率之间存在着松弛的因果关系,并认为生育率是最初原因变量。持此观点的人通过观察发达国家的经常报导,发现孩子少或没有孩子的妇女比孩子较多的妇女似乎更多地受雇在外、离家工作。他们注意到具有大家庭的妇女似乎不像具有小家庭的妇女那样较多地进入劳动力行列。进一步的讨论认为家庭规模不仅决定了妇女是否去工作,而且还决定了她的就业年限。生养几个孩子的决策被看成是先于就业的决定。史密斯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孩子比事业价值高,家庭规模将决定母亲是否走出家门参加工作。

有人认为家庭中最小孩子的年龄是妇女就业的最好标志。在发达国家,按惯例来说,年幼的孩子会大大减少妇女参加工作的可能与机会。对美国、澳大利亚和瑞典的研究表明,家庭中最小的孩子年龄比孩子的个数对母亲出门工作更具压抑作用。但默特(Mott)和夏普诺(Shapiro)在美国的研究却指出这种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今天的妇女,即使她们有学龄前的孩子,也不再回避就业。1978年,美国有6岁以下孩子的母亲中,39%的人加入了劳动力行列,到1982年,有50%以上的学龄前孩子的母亲参加工作。

持女性就业为最初原因变量的人们,也以在美国和其它国家的发现为依据。琼斯指出工作妇女比呆在家里的妇女期望有一个规模较小的家庭,工作妇女比目前尚未工作的妇女更向往较小的理想家庭,而打算将来要工作的妇女比不准备工作的妇女打算生的孩子数要少。

人们还发现,美国妇女的就业年限与孩子的间隔有很大关系,婚后工作时间的长度与生育间隔成正向关联。妇女的工作时间越长,她的生育间隔也越长,其结果是拥有一个小规模的完整家庭。

进行妇女就业与生育率关系调查的人员逐渐意识到两者之间互成因果关系存在着一定的度。60年代已开始注意到这一点,直到70年代中才引入度量经验的非递阶关系技术。

譬如,怀特(Waite)和斯道伦伯格(Stolzenberg),用二阶最小二乘法(2SLS)技术来分析妇女就业与生育率的相互作用。他们对青年妇女劳动市场经历的专门纵向研究(NLS)数据进行分析,考查预计的孩子数和35岁时的就业计划,并涉及一些其它因素,如丈夫的收入,妻子的年龄,文化程度及种族等。结果表明,当相互的因果关系很明显时,就业计划对生育期望值的影响比生育率对就业计划的影响更甚。

史密斯-鲁文(Lovin)和泰克米尔(Tickamyer)利用非递阶模型就1970年机会均等调查(EEO)数据分析妇女就业与生育率的关系。他们对实际行为进行了研究,用妻子婚后工作的年限和在此期间的婴儿活产数作为就业和生育率的度量,其它因素包括妻子的受教育程度,丈夫的收入和结婚年限,结果发现孩子数影响婚后就业,但婚后就业并未改变生育率。他们的发现与怀特和斯道伦伯格的发现有很大不同,但对NLS数据进行的分析发现却是一致的。

克莱姆(Cramer)认为上述两种非递阶模型的不同结果,可能是由于对起作用的变量选择不同的缘故。克莱姆用动态收入专项研究(PSID)数据对选择变量进行灵敏度分析,在这个过程中,怀特和斯道伦伯格的结论得到了证实。就业计划对家庭规模的期望值有抑制作用,而期望孩子数对就业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克莱姆设置了一种方法来观察就业的短期作用,累积到何种程度才对长期的生育率产生影响,并认为仅此才能确定有效影响的性质。

克莱姆对史密斯-鲁文和泰克米尔的发现再次进行核查。由于多共线问题,克莱姆对史密斯-鲁文和泰克米尔的经验结果表示怀疑,但接受他们理论上的推断。克莱姆认为就短期效果看,家庭规模将会影响就业,这一影响还会掩盖任何其它因素的短期影响。他还认为从长远观点看,就业对生育率具有主要的决定性的影响,默特和夏普诺的研究报告证实了这一推论。

讨论妇女就业与生育率因果关系时,若使用复杂高级的技术方法,如二阶最小二乘法估计模型中非递阶途径,应注意该模型包括分析中所用到的分析两种原因变量的几种方法和理论上的两个假设。亚历山大(Alexander)和克莱姆认为,如果违反了两个假说的其中之一,结果就可能出现偏向性或缺陷。因而,妇女就业与生

育率的实际因果关系仍存在着两种解释。只有当新的科学方法和更好的纵向度量技术被创立或被引入,才能解决和澄清非递阶的影响作用。

影响或干预妇女就业与生育率关系的其它一些重要变量,也为研究者们所重视,有必要简述如下。

(一)家庭决策

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观察到的妇女就业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是不尽真实的,而客观上的原因应是由家庭决策结构相联的一般先决原因造成的。尽管另一些学者对此不以为然,譬如斯威特(1968)、怀特和斯道伦伯格(1976)发现,即使对家庭决策结构进行控制之后,妇女就业与生育率的关系依然如此。

然而,家庭决策似乎的确是一种重要的解释变量。一个已婚妇女加入劳动力行列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她在家庭中的地位,有收益的就业使得妇女对家庭作出经济贡献并对家庭具有某种控制能力,因而她有了独立意识,在影响家庭决策时比不工作的妇女更有权威(这种决策包括诸如家庭规模的决策)。妇女参加工作后,将进一步发现自己有能力更好地掌握自己的生活。正如图 1-1 所示,这些都与妇女就业密切关联。就业改善了妇女参与家庭决策的能力,增强了她们对家庭决策的影响,因而可能会导致生育孩子的减少。

(二)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可以用来解释妇女就业与生育率关系中角色不相容问题。对此,斯德克斯和威尔勒对如下的可能性作出推断: